

都市社會學中有關空間的研究

章 英 華

社會學有關人類與空間關係的研究，蓬勃於1920年代人文生態學（human ecology）的興起。這個探究，取法植物與動物生態的研究，欲瞭解人類如何適應於其環境。如此的適應都得透過人類聚居的行為而達成，因此最常受人引用的，乃Hawley對人文生態學所下的定義，“對人類社區之形式與發展的研究”。就如此的定義而言，人文生態學的對象應是任何類型的聚落。由於早期使用此探究方式的社會學家，都集中於最複雜的人類聚落，即都市。因此，所謂人文生態學就幾乎等於都市生態學（Frisbie, 1980）。古典生態學家對社區結構的瞭解，往往放在社區內空間構造的規則，以及土地利用的變化。換言之，便是在分析都市的空間形式與變遷。

（一）人文生態的探究

對他們而言，都市的內部空間構造，並非計劃之下的產物，而是在競爭和土地市場的運作下而形成。在對稀有土地使用的競爭下，產生了地區的分化，造成功能上、活動上相當同質的副地區（subareas），是為自然區（natural areas）。總之，古典生態學的基本前題是，都市的一般空間模式和特定的自然區，都是自由競爭的產物。工業與商業設施在無公共的干擾之下，競求關鍵性的位置，一旦定了位，便具有其經濟優勢，而能左右都市的其他地區。這樣的關鍵位置，通常都占據都市的地理中心，是人們最易接近的地區、地價最高、是人們工作、購物、遊樂活動集中之處。住宅活動，相對而言，則處於較邊緣的位置。而都市住宅，也依經濟因素，最主要的是不動產市場與住宅價格，換言之，社會階級成為這種分化的主要依據。都市的空間構造，一般而言是透過一個成長的過程，是由競爭中取得優勢的活動向外擴張，而形成一連串的生態過程，如入侵（invasion）、接續（succession）、集中化（centralization）和分散化等。Burgess著名的都市空間的同心圓模式，便立基於此理論而形成的（Burgess, 1925; Mckenzie, 1926; Park, 1936）

自1940年代起，古典人文生態學便遭到相當的批評。最受爭議的，便是以經濟因素主導自由競爭的說法，以及強調社區乃社會的生物層面，而排除了文化因素的運作。到了1950年代，大家已不accept文化與生物面的區分。但是有一派學者雖不排

斥文化因素，卻不認為文化因素在人文生態的探討中占有中心位置。

Hawley承認人類社區有著心理的、道德的以及功能的關係，但人文生態的研究只看重功能的關係，是要瞭解人類如何在其棲息地上集體的組織起來以適應其環境。他對這樣的調適的分析集中在四個生態原則，互賴、關鍵功能、分化與宰制（dominance）。他強調社區人口的互相依賴而非競爭。他認為社區是由各種功能不同的單位所組成，在不同功能的關係體系中，總是有一個或極少數的功能將該體系與其環境扣連起來，這便是關鍵功能。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關鍵功能是由私人企業所扮演。一個社區又因其關鍵功能，有不同的功能分化，而擁有關鍵功能的單位，便在生態體系內占據著宰制地位，可以影響到社區的決策，並占據著空間的中心（Hawley, 1944; Saunders, 1981: 67-73）。Hawley晚期的著作（1986），並不界定關鍵功能的特別指涉，而使其說法比Burgess較具彈性，也可應用於前工業社會的都市社區。Duncan（1961）提出生態結叢的架構，認為人口（P），組織（O），環境（E），技術（T）四者的交互影響，造成了生態體系的變化。所謂的空間，應該是人口與環境因素的展現。而組織則可以包括市民運動，行政機構與行政命令等，已不限於經濟因素；但是他刻意指出來，“社會的”並不意味人們的主觀選擇，而是相互依賴的客觀關係。

從文化觀點來探討人類社會的空間組成，最著名的便是Firey（1945）有關Boston的經驗研究。他明白指出Boston的一個高級住宅區，如何在經濟勢力的擴張下，仍繼續其原有的住居特性，藉而主張情感和象徵可以當作一個生態變項。而Hollingshead為文指稱，人類社會是在社會文化脈絡而組織起來的，同時文化價值與慣行可規約競爭過程。Firey與Sjoberg更在1981年時為社會文化的生態探究提出更廣濶的視野。他們引用Eric Cohen的架構，認為人們對環境有著四種價值取向，工具的（視環境為資源的來源），疆域的（對環境的政治控制）、情感的（對環境的依附），以及象徵的（環境的美學的或神聖的意義）。這四種取向的相對重要性，可以決定環境或空間的意義。他們還呼應Cohen指出的，生態觀點對權力的忽視，進一步主張權力是普遍的生態變項。因為依靠權力的運作，一個社會動原資源，以取得社會所界定的目標，這些資源包括土地、工具、知識、威望、美學藝術等，正好都落入Cohen的四個取向之內。權力的變異，於是，可以蘊含上述四個取向的變異。Firey與Sjoberg再例舉，帝國興衰、社會設計、官僚機構在計劃中的折衝與協調、科層組織性質的轉變以及階級衝突等，對都市興衰和土地利用的影響，藉以證明權力在人文生態研究的重要性。可惜的是，我們仍無由得知權力如何貫穿四

種環境取向而影響到都市空間構造。

Duncan的生態結叢以及Firey等人的社會文化生態探究，都想逃出單一經濟因子的解釋，而更圓滿地瞭解生態過程，但它們大致都缺乏對整體都市空間構造的說明，往往只是就空間某一部份的變化提出解釋。同時他們還缺乏古典人文生態學家和Hawley的理論積極性。所提出的只是概念架構（Cohen, 1976）對概念之間的相互關係，甚至解釋的對象都沒有確定的說法。

自Burgess開始，發展出描述都市空間的三種模型，同心圓、扇形以至於複核心，都兼及功能區分與住宅分佈類型的區分，而住宅分佈單以社會階級為準據。後來隨著統計方法的進步，而有社會地區分析與因素生態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 and factorial ecology）的發展。在這種新方法下，空間模式，不能只以社會階級為指標，還要加上家庭地位（Family status）和種族或移民地位。各個指標相互獨立，呈現不同的分佈模式。運用統計分析普查資料時，這樣的指標都可以表現出來。但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此分化的意義何在？有何理論的解釋。Shevky和Bell在提出此法時，強調社會規模（可以類比為都市規模）是造成如此分化的原因。但規模與分化間，卻缺少中間的聯繫。另一方面，透過比較社會的研究，發現現代化程度的高低與三變項的分化程度有著共變的關係。由於這類研究對空間的描述，常限於某一特定時點，還有三個向度，又只重於居住模式，很難配合人文生態理論（Johnston, 1976）。

（二）人口空間集中的純粹影響

Wirth（1938）有關都市性（urbanism）的理論，並不在處理空間形式或空間構造的演變。與一般都市生態研究的關心有所不同，他企圖從人群的空間集中來解釋都市的社會心理現象與社會結構。他曉得，現代都市有許多不同的類型、社會特徵也有所不同。他不否認，在現代社會中，人口大量集中於特定空間，與工業技術、大量生產和資本主義相關。但是他卻強調，我們不應當將都市性、工業化和現代資本主義相混淆。就算歷史上的都市因其發展是在前工業和前資本主義的狀況中，與現代都市有別，但仍舊是都市。他給與都市的定義是，社會性質相異的人群所構成的相大規模的、密集的永久性聚落。這個定義，就Wirth而言應是適用於不同時代各種社會的各類型都市的。我們可以隨而推論說，人口的空間集中對社會心理和社會結構的影響是超越時空的，是獨立於整體社會特性之外的。異質人口的大量集中，一方面威脅到人們的神經系統（此屬心理層面），另一方面導致分化（此屬社會結構層面），二者都使得人們相互隔離。Wirth就此解釋芝加哥學派所強調的

都市現象，即心理壓力、疏離感，個人主義和社會解組。在這理論的影響下，都市與鄉村的二分，一直成為各類經驗研究的重要獨立變項，背後都假定人口空間集中的獨立影響力。

許多經驗研究都發現，不論開發中或已開發社會的都市裡，依然有著個人的社會世界，個人的基本人際關係，甚至地緣社區還持續著。更進一步則認為，都市規模本身並無影響力，而是其他的社會因素導致一些獨特的都市社會現象。最近，Fischer提出副文化的理論（1984:35-39）。他承認個人在都市中仍保有其緊密的社會世界，都市人並不比鄉居者更疏離，更心理失調。但是他認為社區的規模仍有其直接而獨立的影響。在社區中，同性質的人是否能組成獨特的社會世界（亦即副文化），有賴於這些人是否達到“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唯有達到足夠人數之後，他們才具有明顯的被認許的身份，才能彼此廣泛互動，共同行動。而在都市中，才可能有著相當數目的副文化。各副文化間，彼此磨擦，更促使各自的成員更固著於自己的社會世界，而有增強副文化的作用，社會解組的現象，並非都市社會世界崩潰的結果，而是各社會世界所彰顯的副文化之間磨擦所引起的。Fischer的副文化理論與Wirth的都市性理論一樣，都是要孤立出入口空間集中的獨立效果。這種效果同樣不因發展階段整體社會的差異而消失。不過二者對這種效果的界定，卻有其相當的差別。

(三)政治經濟觀點的空間探討

1970年代，以政治經濟學觀點對都市的研究為都市社會學提供了新的典範。這項新的探究，包含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基本上，大都視空間的使用是資本家尋求較大利益的結果。在如此的追求中，資本家並無法顧及其他階級的利益，但階級衝突造成混亂不安，於是不得不實行干預，干預的目的仍在促進資本家的利益。從資本累積和階級衝突來解釋人類的空間使用，也被批評太結構取向了。在此僅介紹兩個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較綜合性的看法。著重點各有不同，但都想避開結構決定的論調，而強調空間形式的社會結構影響下，行動者互動過程中的產物(Baldassare, 1983;29-31;Saunders, 1981;219-248)

Gottdiener（1985:195-262）的起點是，空間形態的特徵和社會組織的結構變遷有著辨證性的關係，並非一方面是“社會因”而另一方面是“空間果”。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的空間形式是資本主義發展中，衝突和爭議下的產物，不一定有益於資本主義，也不是由資本累積過程所決定的。Gottdiener視美國的都會擴張是後期資本主義階段的一個現象。後期資本主義下的最特出的結構轉換是全球性公司的

出現、干預取向的政府，以及知識與技術成為生產力量。如此的轉變對空間可以有四方面的影響。第一、生產力的變化導致工業與資本越來越強的流動性；第二、社會秩序分化成更復雜的結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分支都告增加；第三、政府積極參與社會；第四、空間模式愈來愈分化，愈不均衡。這種轉變須透過一群行動者，才能展現出具體的空間形式。

空間形式的產生必須扣連到以土地為對象而組織起來的特殊社會利益。此一利益形成的財產部門只為資本的一部份，其運作係透過成長聯盟或網絡（growth coalitions or networks）而達成。這些網絡可以包括何階級的人，也常是公共和私人二部門的結盟。它們受到一種“成長”的理念的支持，利用繁榮的概念和成長的迷思，取得行動的合法性。由於此網絡包含了公共部門，包含了政府的直接干預和一些與政黨扣連的政治關係。由於地方政府要有其正當性，對公民的要求極其敏感。如果“反成長”的力量集結到相當程度，可以影響到成長網絡目標的達成。成長網絡不只是空間的經濟操縱者，也受到政治過程的約束。成長部門與其他部門的資本間有著爭議，財產部門之內也有著故對團體間的競爭成長網絡的運作，可以說，同時具有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和經濟的向度。“成長”與“反成長”部門間的對抗，代表著對空間利用的意識形態爭戰。在整個過程中，空間的塑造都是協議下的結果，常是非理性和不協調的模式。Gottdiener試圖就此結構化過程，去解釋人口、產業的分散，和區域間的變動。

Castell早期的觀點被視為是結構決定取向的。在接受了各方的批評之後，他提出了一個跨文化的都市變遷理論（1983：301-336）。在這理論中，空間被視為歷史的產物。所謂都市，乃由歷史中界定了的社會賦予特定空間形式的社會意義。都市意義的界定，是歷史行動者，根據他們的利益和價值，將社會結構起來的根本過程之一。因此都市意義的形成，與社會中各階級以及他們的利益與價值相關聯，同時也與生產方式和發展方式相關聯。但要注意的是都市意義不只是社會結構的反映，而是社會中行動者在結構條件下衝突而成的產物。在界定都市意義的歷史過程中，決定了都市功能的特徵，而都市意義和都市功能二者又共同決定了都市形式。都市形式乃此過程中的象徵性空間表象。像摩天大樓的矗立都市中心，一方面象徵著金錢透過技術和自信對都市的控制，也是欣欣向榮的公司資本主義時代的大教堂；另一方面也有著重要的經營管理功能，並且是對空間這樣商品的重要不動產投資。都市的社會變遷則是透過對都市意義的重新界定，引起功能上的相應變化，同時展現新的都市形式。

Castell為當前先進社會都市意義的再結構，提供了較細緻的論列。目前，如此的社會已進入“發展的資訊模式”的階段。為了應付“發展的工業模式”階段所滋生的困境，社會的優勢階級，在新科技與舊階段遺業二者所呈現的限制與轉機中，採取的手段有兩種，一是都市更新，一是空間功能與形式的更加層級化和專殊化。如此計劃，企圖使人們與空間形式不相關聯，並因此使人們的生活與都市意義不相關聯。所蘊含的都市意義是，人們在空間上、在文化上都與他們的產品和他們的歷史不相連屬。這樣的藍圖遭他另一相對都市意義的挑戰。都市社會運動的產生，即在求取另一種都市意義，要求都市的使用價值、文化自主與自我管理。就此而言，新的都市意義，功能與空間形式，將在優勢階級的計劃和都市社會運動的爭執下而塑造出來。

四結語

都市社會學有關空間的概念，很明顯的是當人類使用或居住的現象發生之後，才展現其意義。就像人文生態觀點，非常強調個人對環境的適應，但自然環境，總只是被設定為常項而已。都市生態的研究，幾乎就是都市社會學成立的主幹，一直是都市社會學教科書必備的一部份。但由於這方面的經驗研究過份重在空間的描述，不但未能改進理論，反而連古典人文生態學強調的過程的意義都不能掌握。像社會地區分析和因素生態分析，發現有三個向度的不同空間分布，若能就此多做理論推敲，或可以豐富都市生態學的觀點，但與一般的經驗研究一樣與生態理論有所脫節，只成為一種指標而已。

Hawley是提供最系統人文生態理論的學者。他的理論有如Simmel的形式社會學一樣，可以讓我們瞭解空間形成的過程，但卻與特定社會的具體特徵不相關聯。社會文化生態的觀點，似乎是要彌補這種缺憾。特別是設法將權力與人們對空間的價值取向串聯起來時，就有著從社會結構的特質去瞭解空間的意圖，只是尚缺乏有力的經驗研究的配合。Wirth和Fischer的理論，讓我們思考的是，當社會結構性質控制之後，人口在空間的集中，是否還有值得注意的影響力？有學者強調，都市人口規模的概念若能更加精緻，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論意含（Frisbie,1980）。

從馬克斯政治經濟學發展出的理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雖強調生產模式的主導性。但已脫出了經濟決定論與階級決定論，而注意到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因素對人類空間形式塑造的影響。更晚進的發展，則是不主張“結構為因空間是果”，而認為應注意結構特質如何透過行動者而造成空間形式的變化。

參考書目

- Baldassare, mark, (ed.) , 1983, Cities and Urban Living. N 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urgess, Ernest W., 1982 (1925) , " the Growth of the City:An Int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 pp. 35-41 in George A. Theodorson (ed.) , Urban Patterns:Studies in Human Ecology.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Manuel,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Eric, 1976, " Environment Orientation: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Social Ec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17(1):49-70.
- Duncan,Otis Dudley, 1982 (1961) , " From Social System to Ecosystem" , pp.123-128 in Theodorson,op. cit.
- Firey, Walter, 1982 (1945) , " Sentiment ond Symbolism as Ecological Variables" , pp.137-141 in Theodorson, op. cit.
- Firey, walter & Gideon Sjoberg, 1982, " Issues in Sociocultural Ecology" , pp.150-164 in Theodorson, op.cit.
- Fischer, Claude S., 1984, Unban Experience, 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uanouich.
- Friesbie, W. Parker, 1980, Theory and Research in Urban Ecology:Persistent Problems and Current Progress." pp.203-219in Hubert M. Blalock, JR. (ed.) ,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Research:A Critical Approach. NY:The Free Press.
- Gottdiener,M.,1985,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Hawley, Amos H.,1982 (1944) , " Ecology and Human Ecology" ,pp.104-110 in Thecdorson, op.cit.
- ,1986,Human Ecology:A Theoretical Essa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ohnston, R.J., 1982 (1976), " Residential Area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Urban Subareas—Social Area Analysis and Factorial Ecology" , pp.297-315 in Theodorson, op.cit.
- Mckenzie , R.D., 1982 (1926), " The Scope of Human Ecology" , pp.28-34, in Theodorson, op.cit.
- Park, Robert E., 1982 (1936), " Human Ecology" , pp.20-27 in Theodorson, op.cit.
- Saunders, Peter, 1981,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Hutchinson.
- Wirth, Louis, 1951 (1938), "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 pp.44-63 in Hatt and Reiss (eds.) , Cities and Society. NY: The Free Press.